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

杨大章： “誓与敌人决一死战！”

新华社天津7月16日电（记者 尹思源）
天津市蓟州区爨岭庙烈士陵园，草木郁郁葱葱，烈士墓碑庄严肃穆，前来瞻仰的游客脚步轻轻，神情凝重。这里，长眠着102位在爨岭庙突围战中牺牲的烈士，中共冀热边特委第一地区专署专员杨大章正在其中。

杨大章，原名杨士英，又名章棣，1909年生于天津市；1923年考入南开中学，在校学习期间接受进步思想影响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6年，他调到山海关—天津—郑州段负责铁路联系工作，借此机会积极组织并领导铁路段抗日救国会工作。

卢沟桥事变后，天津形势日益严峻。杨大章按照党组织的指示，在天津、唐山等地建立抗日救国小组，印发抗日宣传小册子等，对铁路青年职工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。

1939年4月，杨大章和妻子阎国珍（中共党员，化名阎志）前往平西抗日根据地工作，同年7月任晋察冀第六专署（即平西专署）民政科长。1940年，杨大章兼任平西专署秘书主任，不久即调任昌宛县县长。

平西是我党在晋察冀地区建立最早的抗日根据地之一。日军从1940年开始，对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“扫荡”。昌宛是卢沟桥所在地，敌军在这里实行了残酷的“三光”政策。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，杨大章鼓励大家咬紧牙关坚持，并率领全县人民战斗在百花山头、永定河畔。

1943年，冀东形势转好，此前被敌人蚕食的基本区大部分得到恢复，并开辟了大片新区。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，1943年7月，冀热边特委成立，下设五个地委和五个专署，杨大章被任命为第一地区专署专员。

第一地区专署下辖冀热边西部四个联合县，杨大章上任后首先建立机关生活、工作和学习制度；明确汇报、请示和巡视等规定；印发边区政府发布的各项政策、法令；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巩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各项措施。专署还发出关于改造村政权的指示信，指出要坚决清除原村政权中的坏分子，以保证村干部队伍的纯洁性。

1944年5月16日，为尽快整顿地方党组织、加强地方政权建设，杨大章和十三团副政委廖峰、蓟遵兴联合县县委书记季安带领区县干部等200多人进山开会。开会地点团山子距离敌军下营据点不远，敌特活动猖獗，开会消息很快被敌人获悉。17日上午10点左右，敌军袭击团山子，杨大章迅速组织撤离。18日拂晓，队伍遭到敌军包围，杨大章一面组织大家烧毁重要文件，一面组织警卫战士掩护县区干部向南突围。

指战员冒着敌军炮火奋勇冲杀，撕开了一道突破口，部分干部迅速突围。但敌人很快重



杨大章像(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)

新封锁，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，杨大章振臂高呼：“誓与敌人决一死战！”战斗由拂晓持续到将近中午，子弹打光了，就用石头砸。战斗中，杨大章不幸中弹，英勇牺牲，年仅35岁。

战斗结束后，当地抗日干部和群众走遍山岗，收敛了杨大章等烈士的遗体，埋葬在爨岭庙西南的山坡上，但由于各种原因，只确认了杨大章和烈士占中的身份。1957年，爨岭庙烈士陵园建成，杨大章、占中和100位无名烈士遗体葬于园内。战斗发生以来的80多年，附近的村民一直默默守护着这片无名烈士墓。

2021年，天津市蓟州区下营镇将爨岭庙烈士陵园和5公里外的青山岭村天津广播电台战备台旧址两个红色景点有机衔接，建成了一条红色文化长廊，下营镇党员干部担负起讲解任务，成了义务守陵人。

今年26岁的下营镇干部李琦入职后也加入了守陵人队伍，她说：“将士们用鲜血铸就忠诚，英勇而壮烈。我希望借助新媒体传播等方式，让更多人了解这102名烈士的故事。”



黄文杰像(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)

“党的骆驼”黄文杰： 无限忠诚的战士

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大坪镇上塘村，一座“三堂二横”泥砖瓦结构的房子依山傍河而建。这座始建于清朝的房屋，是革命烈士黄文杰的故居。

1902年10月6日，黄文杰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大坪区（今广东省兴宁市大坪镇）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中学期间，他是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。此后，他被黄埔军校录取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经由军校中共组织推荐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。因成绩优异、精通俄语，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的伯力、海参崴一带从事党的工作。

1931年，黄文杰回国，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。此后，他辗转多地，历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、书记，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副部长、秘书长，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之一等，为开展党的组织工作、恢复建设中共地方组织、指导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等不懈努力。

1938年10月12日，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，次日惠州沦陷。南方局特派黄文杰到广州指导广东省委应对。黄文杰作出“省委机关和八路军广州办事处迁往粤北”“广州市委留下组织部长陆新率领部分党员坚持地下斗争”等决定，直至日军占领广州前夕才撤离。

长期在艰苦环境下东奔西跑、忘我工作的黄文杰，1938年冬发现自己患了肺病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病情刚有所好转，他又毅然接受周恩来布置的任务，长途跋涉抵达重庆，在南方局负责党的组织工作，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。

其间，他认真抓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，在重庆主持举办党员训练班，并参与叶剑英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，翻译了不少苏联文章供叶剑英等人讲课参考。他还撰写政论文章，出版了《论政党》一书，并在《群众》《解放》《新华日报》等报刊上发表文章，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。到1939年上半年，南方局领导的各地党组织建设取得明显成效，党员人数发展到8万多人。

1939年7月，因躲避日机轰炸，黄文杰在防空洞里受了凉，发高烧，抢救无效，于8月不幸逝世，终年37岁。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全体同志为之致哀，周恩来、董必武、邓颖超等亲自送葬至墓地。“他是我们党的骆驼，从来没有计较到他所担负的轻重，而能任重致远的渡过艰难的沙漠。像这样一个人，恰恰死在革命艰难的时代，实在是革命的损失。”在《悼黄文杰同志的死》一文中，叶剑英动情写道。

1983年，民政部批准黄文杰为革命烈士。2020年9月，黄文杰被列入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、英雄群体名录。（据新华社电 记者 邓瑞璇）